

# 「南方文化」的理念與實踐 ——《文藝臺灣》作品研究

林慧君

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 中文摘要

1937年以後，日本因應戰局所展開的政治、軍事與文化等政策，使得文學表現的語言與內容幅度受到很大限制，台灣文壇的主導權也因此移轉至在台日人作家手中，其中以西川滿為首的《文藝臺灣》文學社團所產生的影響最明顯。該雜誌創刊號提出以「建設南方文化」為編輯方向，從帝國日本的南方文化政策，到《文藝臺灣》的「南方文化」，透過對三十八期雜誌編輯理念的觀察與作品分析，發現所謂的「南方」仍侷限在「台灣」，「台灣」被視為日本「南方文化」的一部分，「台灣の文化」不是台灣的本土文化，是為帝國版圖中南方區域的文藝而存在。以殖民地台灣的特殊地理條件，並不是不可能由此孕育出日本帝國的南方文化，但在國家機器的干預與統制日趨嚴重的情形下，該文學集團最終與日本中央文壇同步，投入順應時局與配合戰爭宣傳的編輯與寫作，在聖戰協力與大東亞共榮的想像中，自許為日本唯一南方特色的《文藝臺灣》，其南方文化的理念實踐也成了為「日本帝國」的概念効勞的空洞姿勢。

關鍵詞：日據時期、南方文化、在台日人作家、文藝臺灣

# The Idea and Practice of “Southern Culture” ——Study on the Literary works of “Literature in Taiwan”

Lin, Hui-chun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Chang G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Abstract

The political, military and cultural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fter 1937 imposed great restrictions on the language and contents of literary works. The control over the literary circle in Taiwan also shifted to the hands of Japanese writers in Taiwan. “Literature in Taiwan”, a literary group led by Nishikawa Mitsuru, had the most profound impacts. The magazine advocated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culture”, by extending the southern cultural policy of Imperial Japan to the southern culture in Taiwan Litera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works published in the 38 issues of the magazine, and finds that the term “south” was limited to Taiwan, and Taiwan was considered part of the southern culture under Japan. “The Taiwanese Culture” did not mean the local culture of Taiwan. Rather, its existence served the purpose of supporting the literature of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imperial kingdom. Given the unique 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 as a colony, it was not impossible to create the southern culture as part of Imperial Japan. However, the growing inter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state machine, the literary group finally had to synchronize with the literature at the core of Japan by responding to the wartime and writing/editing propaganda. In the imaginary world depicted by the holy war and the Great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outhern culture by Taiwan Literature, which was proud to be the only southern feature in Japan, was no more than empty posturing bowing to serve Imperial Japan.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Japanese occupation of Taiwan, southern culture, Japanese writers in Taiwan, “Literature in Taiwan”

# 「南方文化」的理念與實踐

## ——《文藝臺灣》作品研究<sup>1</sup>

### 一、前言

1933年自日本早稻田大學法文系畢業的西川滿，懷抱著建設「南方文學」的信念，返回自幼生活了十幾年的台灣，一邊擔任《臺灣日日新報》文藝欄編輯，一邊發行雜誌《媽祖》，持續在日本及台灣發表詩、小說等作品。1939年召集了二十一名日本人、十二名台灣人文學者組織成「臺灣詩人協會」，12月刊行新詩雜誌《華麗島》，發行一期後，1940年1月進一步結合島內台日文藝人士、在台日人學術文化菁英，成立「臺灣文藝家協會」，發行《文藝臺灣》。該雜誌創刊號即提出「建設南方文化」的編輯方向，在與時俱進的國策擁護意識下，以呼應時局的各種刊物特輯協助戰爭宣傳。

《文藝臺灣》是日據時期發行最久的綜合性純文學雜誌，這個由日本統治階級主導編輯的刊物，其中也包括了許多台籍作家的作品，在主要編輯西川滿的導引下，形成高蹈的文藝路線，從「日本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屬於「在台灣的日本文學」，但就其所刊登的台籍作家作品來看，也是「台灣文學史」不可不談的部分，若依帝國時期的政治版圖而言，「文藝臺灣」一詞含有「日本的台灣文學」意涵，但名稱的界定並無法真正釐清此階段文學內外糾葛的複雜性。

初期的《文藝臺灣》刊載的作品延續《華麗島》雜誌的風格，以詩為主，漸漸的增加了小說、評論，到1944年1月7卷2期停刊為止，依筆者統計，三

<sup>1</sup>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之研究計畫〈「南方文化」的理念與實踐——《文藝臺灣》作品研究（1940-1944）〉（NSC99-2410-H-255-002）之部分成果，承蒙補助，謹此致謝。

十八期雜誌中出現約二百七十幾位作者，共刊載了三百四十多首詩、九十多部小說、二百二十多篇隨筆，以及數篇評論、劇本等。主要編輯除了西川滿，台北帝國大學教授矢野峰人、金關丈夫（林熊生）、島田謹二經常發表文藝解說性文章或文學評論，長崎浩、高橋比呂美、北原政吉、本田晴光、萬波亞衛等人的詩作，濱田隼雄、川合三良、新垣宏一、新田淳、河野慶彥、日野原康史、大河原光廣的小說，也多發表在該雜誌。台籍作家有龍瑛宗、楊雲萍、周金波、黃得時、陳火泉、葉石濤等作家。

筆者認為日據時期作家的「台灣觀」決定了作家書寫的視野。值得吾人注意的是，《文藝臺灣》將「台灣」視為「南方文化」的一部分，作為帝國版圖中南方區域的文藝而存在，並不是為台灣本土而存在的「台灣文化」，《文藝臺灣》「建設南方文化」的編輯理念是如何落實在作品中？作家如何表現、傳達或轉化此一理念？由創刊初始至各階段，刊物內在發展的脈絡在與外在政治社會的關聯，形成了怎麼樣的「南方文化」？本文為針對三十八期《文藝臺灣》的作品與編輯評述，考察以上問題的結果。

## 二、日本南方表述下的台灣

日本對南方的關注始自明治時代，隨著帝國經濟、政治的發展，與海外的軍事擴張，「南方觀」的形成幾經變化，根據河西晃祐歷時性與共時性的考察發現，日本對「南方」所屬地理位置的定義，隨帝國政策而不斷擴編，形成一個「創造」的「表象的南方」，是日本想望的南方。從二〇年代帶有歧義的「土人」、「未開化」觀點，到三、四〇年代對南方地區的褒貶不一的變化，由於文本脈絡不同，政治、經濟以及民族、語言學術對南方的表述也不盡相同<sup>2</sup>。

政治性的敘述方面，九一八事變前對各地民族運動採否定或漠視的態度，例如認為菲律賓的獨立並不具有成為一個國家的程度。但日本在事變後從國際聯盟退出，為了正當化「東亞新秩序」、「大東亞共榮圈」的國策構想，日本對南方的關心高漲，從以往的「土人」說過渡到「同亞洲人」說，為迫使西方帝

<sup>2</sup> 河西晃祐，〈表象としての「南方」——一九三〇年代における「南方——東南アジア」觀の形成——〉，《歷史評論》620（2001年12月），頁80。

國解放殖民地，南方諸民族成了與日本人共同抵抗西方的亞洲人，解放南方諸民族成了日本人的使命<sup>3</sup>。

經濟性的敘述方面，南方一直被視為是日本的「大寶庫」、「大富源」，而且認為南方諸民族對大和民族存有開發的「期待」，日本大東亞共榮圈便是承續這種經濟支配性的南方觀點，日本判斷南方民族開化與否的「標準」在於是否具有近代意義的勞動能力，以為有效動員南方熱帶勞動力<sup>4</sup>。

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與時並進的學術論述，型塑了有利日本帝國發展的南方言論。「南方起源說」主張南方諸民族與日本人有相同的祖先，南方成了日本民族的故鄉，「南進」為兩者間一脈相連的歷史，甚至與日本文化中的南方要素有血統因緣，因此認為日本人較諸西方人更能適應熱帶生活，甚至有回歸故鄉的情懷。此一自圓其說形成共榮圈思維的意識形態，而南方諸民族在日人眼中的形象也由「野蠻」、「未開化」，轉為受肯定的「樸素」、「純真」修辭<sup>5</sup>。

在南方表述中，台灣的地位又如何？根據後藤乾一的研究，日本統治台灣初期對南洋發展有極高意願，即視台灣為通向南洋（南方）的鑰匙，是未來向南洋發展的根據地。一次大戰期間日本總出口較東南亞各國大幅上揚，國內對南方的經濟關注明顯上升。作為日本資本而存在的台灣，在當時有「圖南飛石」（南進踏腳石）之勢<sup>6</sup>。台灣籍民在南方甚至獲得和日本同等待遇<sup>7</sup>。

殖民地的教育事業，也呼應日本南洋發展需要，以訓練為日軍南方占領區建設要員為重要目標。1928年設立的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為日本大學中首次設有南洋史學專業，可說是以殖民政策學觀點成立的<sup>8</sup>。

1935年後，強調日本南進的刊物增多，台灣的南進基地重要性再次被強化。總督府措詞從「南洋」、「南方」到「南方共榮圈」的變化，從實態調查到南進政策化。1936年海軍系統出身的小林躋造就任第十七任總督，輿論出現「武

<sup>3</sup> 同註2，頁83。

<sup>4</sup> 同註2，頁87-88。

<sup>5</sup> 同註2，頁90-92。

<sup>6</sup> 後藤乾一，《近代日本と東南アジア——南進の「衝擊」と「遺産」》（東京：岩波書店，2010），頁79、81。

<sup>7</sup> 中村孝志，〈台灣籍民諸問題〉，《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日本南進政策與台灣》（台北：稻鄉出版，2002），頁89。

<sup>8</sup> 同註6，頁94。

宮總督復活，台灣南進策源地復活」的說法。1939年小林躋造總督發表〈事變下的台灣與南支南洋〉一文，指出南洋為資源供給地與商品需要地，也是企業移民地，台灣作為帝國南方發展的根據地，地位益顯重要。陸海軍以台灣作為全面南方作戰的基地，1940年底台灣軍司令部成立「台灣軍研究部」，針對南方作戰直接所需進行研究、調查與實驗。1941年日本軍事化南進下，作為前進基地的台灣，總督府進入總動員體制制度化階段。台灣皇奉公會成立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拓南農業戰士訓練所、海洋訓練隊，為訓練台灣青年為皇民，並擔任日軍占領下東南亞一帶的南方建設要員<sup>9</sup>。

因於帝國南進政策，使台灣具有南方實驗地與跳板的重要功能，殖民地台灣的地位日顯重要，對文化的形成產生力量。然而在功利導向的殖民政策下，處在動態「南進」意義下的台灣，以在台日本人為首的《文藝臺灣》雜誌如何形成文化理念，又如何實踐該文化理念，是必須進一步觀察探索的。

### 三、《文藝臺灣》的南方文化觀

在南方熱的政治經濟氛圍下創刊的《文藝臺灣》，以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指導理念與西川滿的「南方文學」編輯理念，在「南方文化」中實踐帝國日本的南方文化政策，從藝術至上以及充滿異國情調的方向出發，可說與日本南洋文學的發展趨向一致，亦即充滿對南方的熱帶憧憬與官能誘惑的好奇。處在日本南方熱的南方中，《文藝臺灣》如何表述南方，柳書琴指出《文藝臺灣》集團雖然不時強調「南方」此一具國策意味的字眼，但實為「浪漫的南方」，而非「國策的南方」<sup>10</sup>。筆者進一步觀察發現，《文藝臺灣》所展現的「南方」侷限在「台灣」，隨著台灣因帝國南進政策而水漲船高的地位，《文藝臺灣》強調在台文的日本文學是南方文化的代表。

島田謹二以筆名松風子 1939年2月發表於《臺灣時報》的〈臺灣に於けるわが文學〉（在台灣的我國文學），參照法國人在殖民地產生的外地文學，抽繹

<sup>9</sup> 同註6，頁87、96-98、107-108。

<sup>10</sup> 柳書琴，〈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台灣的文學活動（1937.7-1945.8）〉（台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頁87。

出外地文學的三種志向：「外地人的鄉愁」、「描寫土地的特殊景觀」（異國情調）、「解釋土著人的生活」（寫實主義），指出在台日人文學除了「鄉愁」與「異國情調」外，今後更要有「寫實主義」的發展。《文藝臺灣》創刊號即刊登島田的〈外地文學研究的現狀〉一文，其後各號出現的日人作品，明顯取材於台灣社會，而且朝島田所倡導的外地文學理論發展。該雜誌創刊號後記所說：「決心和台灣各位島民一起認真鑽研，一心邁向建設南方文化」，也可說是編輯部將島田的外地文學理論嫁接到政治意識形態下的南方文化觀。島田認為：

台灣的文學作為日本文學之一翼，其外地文學——特別作為南方外地文學來前進才有其意義。和內地風土、人和社會都不同的地方——那裡必然會產生和內地不同而有其特色的文學。表現其特異的文學名之為外地文學……南方的——外地——這就是台灣作為日本文學中之一翼佔有的特殊意義。<sup>11</sup>

從文化理念的想像層面來看，「外地文學」和「南方文學」的意涵仍有所不同。島田的「外地文學論」是針對本土以外的地方——台灣，為在台日人文學尋找以日本中央為準的出路，是日本內地延伸出去的地方文學，而西川滿的「南方文化」則隱含著以台灣為日本南方中心的可能。橋本恭子研究指出，島田將西川詩作中的南島特有精神，投影以對南歐文學的嚮往，以對抗長期以來支配中央文壇的北歐價值體系，因此島田或西川所謂的南島特有的精神，以及所建構的「南方文學」藍圖，並不是根基於台灣現實的鄉土<sup>12</sup>。邱雅芳指出島田的寫實主義明顯具有官方姿態，以帝之眼詮釋殖民，比照西方學者的東方學，可視為一種南方主義，建構屬於在台日人作家的南方書寫系統<sup>13</sup>。

依據橋本恭子的研究，島田「外地文學論」所想要達到的，也就是內地人文學在台灣出路，將台灣社會的特殊性視為日本帝國一部分的南方文化，在

<sup>11</sup> 〈臺灣的文學的過現未〉，《文藝臺灣》2卷2期（1941年5月），引自葉笛譯，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一冊（台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頁106。

<sup>12</sup> 橋本恭子，〈在台日本人的鄉土主義——島田謹二と西川滿の目指したもの〉，《日本台灣學會報》9期（2007年5月），頁244-246。

<sup>13</sup> 邱雅芳，〈南方作為帝國欲望——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頁223。



「南進化」的展望上開拓獨自之路<sup>14</sup>。因此，外地文學作為內地的延伸，也要建立台灣獨自的文學，如此才能在日本文學中占一席之地，尤其更要發展「寫實主義」，書寫具有在地特色的文學。吳叡人則指出島田以外地文學的寫實主義美學作為衡量作品藝術性的標準，卻忽略了在台日人土著化與美學政治化的邏輯<sup>15</sup>。

因此，出現在《文藝臺灣》中不論名之為「外地文學」、「南方文學」，或是偶爾出現的「台灣文化」，皆顯示出帝國以文化之名企圖建構所謂「進步性」的新文化，是日本化的台灣文化，以作為日本地方文化的一環。

成為南進基地的台灣，似乎擁有了被南洋人民視同為日本殖民者的入場券，然而文化形成過程中不均的交流與混雜，也讓台灣文化失去了現實主體。《文藝臺灣》將「台灣」視為日本「南方文化」的一部分，作為帝國版圖中南方區域的文藝而存在，卻不是為台灣本土而存在的「台灣文化」。《文藝臺灣》展現「南方文化」理念的內容是「在台灣的日本文學」，持續著南方浪漫熱情的異國情調元素外，並強化倡導「皇民化」、「現代化」的主題書寫，可視為同人南方想像共同體的實現，將台灣從「日本的南方」導向「南方的日本」，促使「南方文化」成為具指導意涵的言說，以作為「南方共榮圈」的文化指標。

#### 四、《文藝臺灣》的南方文學發展

台灣作為日本南方殖民地經營基地與南方文化發祥地，在「南進基地化」與「皇民化」、「工業化」治台三原則的國策下，以建設南方文化為使命的《文藝臺灣》，以「台灣論述」所形成的南方文化，在認同上遭遇較母國北方文化更多的衝突，或被認為藝術性不足，或是停留在對異境情味的好奇心態。《文藝臺灣》創刊時日本殖民台灣已經四十五年，在功利導向的殖民主義政策下，文化的形成顯得漫長，以殖民地台灣的特殊地理條件，並不是不可能孕育出日本帝國的南方文化，但在國家機器的干預與統制日趨嚴重的情形下，文化力備受政

<sup>14</sup> 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以「外地文學論」為中心〉（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頁93-95。

<sup>15</sup> 吳叡人，〈重層土著化下的歷史意識：日治後期黃得時與島田二的文學史論述之初步比較分析〉，《臺灣史研究》16卷3期（2009年9月），頁146。

治力干擾，《文藝臺灣》南方文化的理念與實踐的發展，深受時局與政策變化的影響。以下從雜誌刊初期，循著重要事件的發展軌跡，探討《文藝臺灣》南方文學發展的情形。

### （一）創刊初期

1940年日本將戰局從中國擴大到東南亞，進入所謂的「大東亞戰爭」時期，是年10月成立「大政翼贊會」，在新體制運動的高度國防國家理念下，每一個國民都需盡力發揮力量，文化的政治效用受到重視，文學者也編入組織中，台灣文壇進入戰時體制。

同年1月創刊的《文藝臺灣》，作為「臺灣文藝家協會」機關雜誌，以「建設南方文化，提升台灣文藝」<sup>16</sup>為目的，在編輯方式和作品內容仍處於摸索期，文學與美術並重，以台灣色彩的民俗圖文展現地方特色，島田對法國文學的評論譯介、楊雲萍的古典考據、金關丈夫對於西洋名畫的解說等，大抵展現提升台灣文藝的意念。

就文學創作而言，此時期的詩作多呈現出飄泊無根的旅人意識與思鄉情懷，濱田隼雄的小說〈病床日記〉、〈橫丁之圖〉，顯露出一種北方式的陰暗，如龍瑛宗〈《文藝臺灣》作家論〉指出：「鳥瞰《文藝臺灣》，雖說整體上多半是與生活乖離的作品或詠嘆自然的作品。既然是草創時代，只是一個摸索的型態，不如等待今後的好結果」<sup>17</sup>。

此時期西川滿以帝國歷史發現者的身分發表了小說〈赤嵌記〉<sup>18</sup>，在建構屬於帝國史的台灣歷史小說時，〈赤嵌記〉中直指「台南人不太愛惜自己所在的土地和歷史」（頁435），顯現出西川滿居高臨下的視線。與陳永華家族有宗親關係的陳姓青年，向「我」傳遞地位遭史家埋沒的延平郡王三世克弊夫婦的願

<sup>16</sup> 〈あとかき〉（後記），《文藝臺灣》1卷2期（1940年3月），頁148。

<sup>17</sup> 龍瑛宗，〈《文藝臺灣》作家論〉，《文藝臺灣》1卷5期（1940年10月），頁403，中譯引自林至潔譯，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三冊，頁40。

<sup>18</sup> 〈赤嵌記〉，《文藝臺灣》1卷6期（1940年12月），中文版為陳千武譯，《西川滿小說集2》（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引文中譯為筆者參照原文與中譯版完成，所示頁次為日文版。

望，青年熱心慇懃「我」撰寫歷史性文章，因為「鄭氏時代的赤嵌樓，留下了相當值得記錄的事蹟」（頁 436），彷彿克壑夫婦精靈再現的陳姓青年及女子，將歷史翻案的重責大任交由「我」，帶出西川滿寫作殖民地台灣史的「正當性」、「使命感」。

西川滿欲將個人生命史與帝國歷史接軌的歷史小說，以統治者的眼光回顧日本統治台灣的歷史，為日本讀者展示異國風俗與開拓海外領地的神話，從血統和現代化切入，將明鄭、滿清時期的台灣史加以截取、轉化，在政權交替的敘事中滲入帝國的陰影，並鑲入新體制、南進策、前進南方等呼應時局的標語。這類將台灣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加以提煉想像，並以虛構手法再現的歷史小說，顯示作家在殖民統治位階下，將日本統治台灣的意義正當化的意圖。

工藤好美指出這是西川滿藉著描繪「過去」以托付自身感懷之作<sup>19</sup>，從自己特定的地域和文化視角出發，藉著再詮釋歷史書面資料的「過去」，企圖對自身的主體性加以合法化。由西川滿的歷史小說發現，他所認同的台灣，是一個經過篩選、想像、加工的華麗世界，並以此以一世界的代言人自豪。透過將殖民地社會、文化與日本母國一體化的過程，以符合重新整編的殖民地統治方向——南方共榮圈想像，那種游離、不安定、兩處茫然的雙鄉情結，得以暫時棲止在呼應時局的文本安排上。

南方文化之於西川滿，不論是取材於台灣風物、民間傳說的傳奇式作品，或是雜糅台灣歷史、野史、地誌的歷史作品，皆表現出耽美的浪漫主義色彩，出版物以裝幀本展現之視覺語言，顯露出作家個人的嗜好，形成一種居高臨下凝視的文化圖像。我們在此階段《文藝臺灣》的廣告欄可以看到以「南方文學巨彈」的文案，宣傳限定本詩集《華麗島頌歌》合訂本詩集，其中包括充滿華麗南方異國情調的詩集《媽祖祭》、開展出明亮神祕世界的散文詩集《亞片》，與滿溢南方浪漫香氣的《頹唐輓歌》三部作品，並明言「一本可明白南方詩人的全貌」<sup>20</sup>。花妖傳奇小說集《梨花夫人》的廣告詞為「作者獨佔全場明亮的

<sup>19</sup> 工藤好美，〈臺灣文化賞と臺灣文學〉，《臺灣時報》279 號（1943 年 3 月），中譯引自邱香凝譯，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四冊，頁 111。

<sup>20</sup> 《文藝臺灣》1 卷 4 期（1940 年 7 月）。

南方浪漫與幻想」<sup>21</sup>。從創刊初期，西川滿式南方文學偏好就成為全誌文化理念中的主要元素。

## （二）臺灣文藝家協會改組

1941年2月總督府情報部介入成立新「臺灣文藝家協會」，舊協會的機關雜誌《文藝臺灣》改由「文藝臺灣社」發行，編輯方向與作品內容也逐漸展露文學奉公的意識。根據井手勇的考察，《文藝臺灣》陣營對文學奉公意識的萌生，始於大政翼贊會展開新體制運動以後，首次具體呼應時勢要求的是《文藝臺灣》2卷6期（1941年9月）出現的「戰爭詩特輯」，以及和志願兵有關的小說，川合三良的〈出生〉和周金波的〈志願兵〉。然而集團中的日人作家更早已開始配合國策發聲，在《文藝臺灣》1卷6期（1940年12月）、2卷1期（1941年3月）特設〈新體制と文化〉專欄討論。而主要編輯西川滿、濱田隼雄等日人作家也陸續發表擁護、宣傳國策性質的言論和作品<sup>22</sup>。

2卷6期「戰爭詩特輯」收錄西川滿〈赤嵌攻略の歌〉，以鄭成功擊退荷蘭人暗喻日本與西方帝國的對峙勝利可期，以及長崎浩〈明暮〉、萬波亞衛〈佛印進駐〉、高橋比呂美〈荒鷲讚歌〉，歌詠戰爭帶來了新希望，此外，還收錄島田謹二〈領台役に取材せる戰爭文學〉（取材領台之役的戰爭文學），指出以文藝協力皇軍戰功的方向。同一期小說方面收錄與志願兵相關的川合三良〈出生〉、周金波〈志願兵〉，為總督府於六月發表的本島人志願兵制度宣傳，井手勇認為此時期《文藝臺灣》已能隨時呼應時勢的要求<sup>23</sup>。

改組後的《文藝臺灣》集團落實「南方文化」的作法，為推動設立台灣第一個文學獎「文藝臺灣賞」，為了「台灣文學的榮耀與發展」，期待本島文學者「以文學實踐臣道，樹立在台灣的日本南方文學」<sup>24</sup>。

<sup>21</sup> 《文藝臺灣》1卷5期（1940年10月）。

<sup>22</sup> 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1），頁105-106。

<sup>23</sup> 同註22，頁106。

<sup>24</sup> 《文藝臺灣》2卷1期（1941年3月），頁2。

民俗考據仍持續作為呈現地方文化的特色，《文藝臺灣》自許成為「台灣文化之活博物館」<sup>25</sup>，2卷5期〈新版台北風物圖繪〉（1941年8月）以圖文從食衣住行娛樂方面展示台灣，雖然仍不脫展現異國情調、加強日本母國讀者對台灣了解的意圖，但也漸漸流露出對自己生活在台灣的自覺，這也是濱田隼雄對在台日人的呼籲：「台灣的真正的文學產生於對這個島的愛」<sup>26</sup>，住在台灣、生活在台灣是一件需要被確認且影響作家看待台灣人事物的視野。

此階段作家作品內容呈現尋找台灣在身分認同中位置的傾向，如川合三良〈轉校〉（轉學）描寫在台灣出生的竹田洋一因故遷回父親日本的故鄉，小學二年級的他獨自面對周圍同胞的歧視，父親又冷又暗的故鄉成了異鄉，夢中出現的是台北的人事物。透過孩童的視線，直接呈現灣生在內地的處境，透過潛意識的直覺反應，表達出灣生真正的鄉愁所在。日野原康史〈河のほとり〉（河畔）內容觸及在台日人的土地認同與內台融合的理想。此外不少作品寫出灣生視台灣為故鄉的認同歷程，如川合三良〈或る時期〉（某個時期）描寫高中畢業後回日本上大學的灣生洋一，因思想問題遭停學，變得神經衰弱而到故地台灣旅遊，透過熟悉的景物，尋求精神的洗滌。龜田惠美子〈ふるさと寒く〉（故鄉好冷）寫灣生勢子與少小離家的父親回日本探親的過程，以及北原政吉〈愛する台湾の歌〉歌頌台灣令人產生思鄉情懷。日野原康史〈五號室〉藉著醫院病房中病人的交談，寫出多位在台日人的生活圖像，以及他們居留台灣的心態，透過即將接受手術面臨生死關頭的主角說出「來台灣要工作到埋骨於此」的決心<sup>27</sup>。

《文藝臺灣》自3卷1期開始連載最初長篇小說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描寫日本移民台灣的農民歷經三十年奮鬥栽培蔗糖的經過，開頭獻詞提到「各位生存的身影，才是日本人南方發展的尊貴歷史下的美麗插曲」<sup>28</sup>。小說中的指導員國分論及移民事業與台灣的意義：「對於沒有土地而一籌莫展的內地

<sup>25</sup> 〈瓜月消息〉，《文藝臺灣》2卷5期（1941年8月），頁72。

<sup>26</sup> 〈ことあげ〉，《文藝臺灣》2卷2期（1941年5月），頁66。

<sup>27</sup> 《文藝臺灣》3卷1期（1941年10月），頁86，中文筆者自譯。

<sup>28</sup> 同註27，頁10。

農民，不得不往外地發展。臺灣正是為此而存在的。」<sup>29</sup>張文薰指出濱田顯現出為日本人殖民開拓台灣正名、作史的意圖<sup>30</sup>。

移民村中的農民踏著台灣農民走過的滿是荊棘的開拓道路，精神方面則經歷著成為永遠的外地日本人的掙扎，身在台灣的日本人卻彷彿心不在焉，充滿著在日本／台灣，卻又不是在日本／台灣的矛盾。南方文化何去何從，在西川滿浪漫華麗的色彩外，現實主義的發展當是《文藝臺灣》作家考量的面向。

### （三）太平洋戰爭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文藝臺灣》更加強化擁護國策的意識，不但在3卷4期（1942年1月）卷首誓言要徹底打破因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美名卻游離國民全體感情的舊文學理念，要創造新國民文學以邁向勝利的國家（卷首），編輯在社報上要求作家要留意時勢（頁93）。太平洋戰爭以後《文藝臺灣》所刊登的詩歌作品多為了歌頌戰爭、提高士氣（如5卷2期「大東亞戰爭特輯」），小說題材也以促進內台融合（如〈尺的誕生〉、〈阿里山通信〉、〈一つの縮圖〉、〈石男〉）、加強皇民教育（〈城門〉、〈盛り場にて〉），以及加速台灣歷史的帝國文本化（如〈採硫記〉、〈龍脈記〉）為主，並且以台灣為南方共榮圈文化的出發點，帶入南中國、東南亞與中南半島相關敘事。此時期南方不僅代表光之源，並因戰爭勝利帶來更多歡喜<sup>31</sup>。

「南方」一詞也頻繁出現在雜誌中，「南方文化的基地」、「南方日本文化的金城湯池」<sup>32</sup>、「南方的文化雜誌」、「日本唯一的南方特色」<sup>33</sup>，4卷2期雜誌封面印上「南方文化の建設」標語。龍瑛宗以〈南方の作家たち〉（南方的作家

<sup>29</sup> 《文藝臺灣》3卷4期（1942年1月），頁87。

<sup>30</sup> 張文薰，〈「外地」的意義——濱田隼雄的文學軌跡〉，《台灣文學的東亞思考——台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頁386-387。

<sup>31</sup> 吉江喬松以詩「南方是／光之源／賦予我等／秩序／歡喜與／華麗」題贈予西川滿，也促使西川返台從事文藝活動。西川滿，〈紙人豆馬〉，《文藝臺灣》5卷3期（1942年12月），頁50。

<sup>32</sup> 《文藝臺灣》3卷6期（1942年3月），頁64。

<sup>33</sup> 《文藝臺灣》4卷2期（1942年5月），頁8。

們)<sup>34</sup>為題，評論台灣文壇的日籍、台籍作家作品。濱田隼雄說：「目前需求量最大的題材，就是描寫為了建設南方而歷經千辛萬苦的日本人的模樣吧！想想看，馬來西亞啦，菲律賓啦，往後的建設工作確實都會採用很多占領台灣當時的經驗。」<sup>35</sup>「南方」不單只是地理位置的修詞，還被賦予積極前進的意圖。

「以文學實踐臣道與樹立在台灣的日本南方文學」為宗旨的「文藝臺灣賞」於此階段公布結果<sup>36</sup>，從第一屆得獎的作家川合三良、周金波與作品特色看來，所謂的南方文學包含了生活在台灣的覺察、戰爭協力與皇民鍊成等元素。

川合三良得獎的作品〈轉校〉、〈或る時期〉、〈出生〉、〈婚約〉，自傳色彩濃厚，以台灣為舞台，將台灣視為日本「國土」一部分，或寫在台日人處境，或寫日人家庭日常生活，並反映從軍經驗。比起文筆老練暢達的川合三良，以〈水癌〉、〈志願兵〉獲得審查委員矢野峰人、島田謹二的青睞的周金波，得獎評語則強調其本島出身、取材本島人生活，雖具強烈批判意識，但具有特色與風格。身為幼年即在在日本生活成長的經驗，加上日後留學日本返台的殖民地作家，周金波對殖民母國教化的回應，〈水癌〉中以一種帶有距離感的姿態批判「本島」陋習，〈志願兵〉中探索成為皇民的歷程，獲得《文藝臺灣》編輯群的好評，編輯委員濱田隼雄在3卷1期〈社報〉要同人「向周金波君的進步看齊。為創作〈水癌〉而相當辛苦的周君，能寫出像上一期〈志願兵〉般的佳作，因於周君為人的誠實與努力」<sup>37</sup>。

然而同為《文藝臺灣》集團的作家龍瑛宗，從南方視野評論周金波「無論是南方明亮的光，或是秀麗的風景，似乎都難以進入其眼中。」<sup>38</sup>早期龍瑛宗即指出張文環是個「能體會散文精神的作家，希望他能為建設南方文學如此困難的工作投入更多的熱情。」<sup>39</sup>龍瑛宗欣賞西川滿的浪漫主義傾向，認為「像

<sup>34</sup> 龍瑛宗，〈南方の作家たち〉，《文藝臺灣》3卷6期（1942年3月）。

<sup>35</sup> 〈鼎談〉，《文藝臺灣》4卷3期（1942年6月），頁34，中譯引自涂翠花譯，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三冊，頁309。

<sup>36</sup> 《文藝臺灣》4卷3期（1942年6月），頁26-27。

<sup>37</sup> 《文藝臺灣》3卷1期（1941年10月），卷末。

<sup>38</sup> 龍瑛宗，〈南方の作家たち〉，《文藝臺灣》3卷6期（1942年3月），頁71，中譯引自林至潔譯，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三冊，頁264。

<sup>39</sup> 龍瑛宗，〈《文藝臺灣》作家論〉，《文藝臺灣》1卷5期（1940年10月），中譯引自林至潔譯，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三冊，頁43。

那樣具南方風采、明亮的藝術感是與生俱來的。」<sup>40</sup>處在日人文學集團中，浪漫卻難掩孤獨的龍瑛宗，在評論與作品中表現出強烈的南方自覺性，將台灣置於大南方的廣袤下，追求其浪漫藝術的理想與表現對普遍人性的關懷<sup>41</sup>。

自3卷1期至4卷3期（1941年10月至1942年6月）連載於《文藝臺灣》的〈南方移民村〉前半部，未連載完即於1942年7月在東京出版單行本。作者刻劃並歌頌農業移民在台灣土地上與大自然奮鬥的精神之餘，卻未能將筆鋒深入總督府的農業移民政策問題，或糖業公司的制度組織缺陷等，一方面呈現出農民「植」民台灣的困境，一方面也顯出國策配合下作者失去了原有的嚴格批判精神。

單行本結尾第一代移民嘉兵爺對下一代彌太郎提出遷村台東平原的建議，然而從戰地歸來的彌太郎則決定選取南洋，台灣移民村的出路最終寄託在東亞共榮圈的聖戰想像<sup>42</sup>，純粹的日本人身分並無補於農業移民價值的追求，在無法自給自足的情形下，處在殖民資產階層與被殖民階層間左右夾擊的狀態下，認同外地為內地的一環必須藉由「皇民聖戰」的加持，視台灣為內地向南方前進的重要樞紐。將土地認同的失敗經驗，披上皇民聖袍站在最前線，投入聖戰體系，始能認同台灣為內地的一環。彌太郎說：

在南方的島上，與新民族一起，把將近三十年在這村子充滿苦難的體驗，耐得住炎熱的農民團體，甘蔗農業的技術等，開始派得上用場。<sup>43</sup>

<sup>40</sup> 龍瑛宗，〈《文藝臺灣》作家論〉《文藝臺灣》1卷5期（1940年10月），中譯引自林至潔譯，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三冊，頁43。

<sup>41</sup> 關於龍瑛宗的南方觀，吳昱慧的研究指出，龍瑛宗將「南方」作為自我命名、自我發現、寄寓其精神所指涉的符號，以文字追求憧憬的、藝術化的、生命化的「南方想像」，是為承載他個人以文學探索「人的精神」之內涵與象徵。詳見吳昱慧，〈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南方想像」——以龍瑛宗為例〉（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sup>42</sup>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教授藤好美〈臺灣文化賞と臺灣文學〉一文，針對小說後半部大東亞戰爭之際移民村要南遷的觀點提出批評：「這個地方顯出來的歷史觀應該至今都沒有成為作者實際的信念。這只是外界所給予的官方命題而已，作者卻直接把它強加在過去的事實上。」原刊於《臺灣時報》279號（1943年3月），引自邱香凝譯，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四冊，頁115。《南方移民村》發表當時，同時代評論家如寶泉坊隆一指出此作明顯帶有「政治性的侷限」，竹村猛認為「以作者的才能將結尾與時代性格之焦點合一」。後世研究者如尾崎秀樹指其「印上時局歪曲的烙痕」，河原功認為「對台東製糖之移民事業的批判不完全」、「對蔗農與糖廠之對立關係的忽視」、「後半部分急速決定遷村南方的唐突描寫」。參考張文薰，前引文，頁383-384。

<sup>43</sup> 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前半部分連載於《文藝臺灣》3卷1期至4卷3期（1941年10月至1942年6月），未連載完即於1942年7月在東京出版單行本。本引文依據中島利郎、河原功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第三卷所收，頁477。



「南方移民村」繼續前往距離內地（日本）更南的外地（南方）後，把在台灣的苦難體驗視為南進殖民的優越條件的移民村農民，在往更南方的移動中回望母國時，將會如何看待有先人埋骨的殖民地台灣，台灣是否會成為南方新天地中鄉愁棲止的所在，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作為殖民母國外地的台灣，在南進政策下是否被視同為內地仍不明朗，而即使被推進成內地，終究只是一遭邊緣化的「內地」。

#### （四）大東亞文學者會議

1942年7月，在日本的文學報國會成立不久後，新「臺灣文藝家協會」進行改組，開始加強對文學的統制。同年11月在東京舉行的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統合了日本帝國統治下的亞洲各殖民地的知識分子，加強對大東亞聖戰的認同。台灣派遣西川滿、濱田隼雄、龍瑛宗、張文環出席，返台後在「臺灣文藝家協會」主辦、「皇民奉公會」支持下，展開巡回台灣各地的「大東亞文藝講演會」<sup>44</sup>。「臺灣文藝家協會」會長矢野峰人發表〈臺灣文學の黎明〉：

台灣代表出席此一大會，不再是原來單純的地方代表，也不再是原本被冠以「外地」說法的特殊地域代表，而是成為可以光榮代表日本對外的一員……此際台灣代表學習大東亞的精神為何物，確認了今後朝日本文學前進的方向，也顯示了將來本島文學的進路。<sup>45</sup>

《文藝臺灣》集團確認台灣文學不再是殖民母國陰影下的外地文學，經由此次大東亞會議的號召，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已成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成為日本文化的代表之一，成為與南方圈諸民族共榮共享的一員。此後台灣的文藝統治方針逐漸由「地方文化建設」，走向「大東亞文學建設」，《文藝臺灣》集團作家熱心的在第一線上支持政策，一一推出「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特輯」、「國民詩特輯」、街頭文學「辻小說特輯」、「詩集大東亞戰爭」，以及推動朗讀活動，積極提高台灣的國語普及程度，以作為南方共榮圈文化建設的標桿。

<sup>44</sup> 參考井手勇，前引書，頁92-96。

<sup>45</sup> 矢野峰人，〈臺灣文學の黎明〉，《文藝臺灣》5卷3期（1942年12月），頁8-9。

1943年2月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文化部頒發第一屆「臺灣文化賞」，以表揚提昇台灣文化有功的文化人或文化機關，以小說為對象的「臺灣文學賞」頒給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西川滿（《赤嵌記》）、張文環（《夜猿》）。4月29日總督府成立「臺灣文學奉公會」，致力推動皇民文學，新「臺灣文藝家協會」同時宣布解散，台、日作家皆歸「臺灣文學奉公會」所屬，文學奉公會和文學者的關係，根據柳書琴的分析，從較不具強制性的指導／協力關係，變成絕對強制性的上司／臣屬關係<sup>46</sup>，完成了決戰下「文學報國」的動員體制。

其間身為「臺灣文學賞」審查委員之一的台北帝國大學教授工藤好美，為文批評文學賞設立的矛盾，並對兩位得主張文環、濱田隼雄現實主義創作的懸殊提出評論<sup>47</sup>，引起了不同民族、立場與文學意識形態作家對戰時文學典範的爭論<sup>48</sup>。濱田隼雄首先為文批判：「在我們的文學中，特別是描寫本島人的作品的大部分，都只是對負面的現實的實物素描。」<sup>49</sup>西川滿則批評台灣文學中一成不變的描寫欺凌養子、家族糾葛等風俗是「糞現實主義」<sup>50</sup>，痛批台灣文學對皇民化和決戰態勢不積極不肯定，對《臺灣文學》陣營的批判昭然若揭。柳書琴分析這場背景、經過及論爭內容龐雜的「糞現實主義」論戰，從開始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本土文學／外地文學的議題之爭，惡化為文學派系與作家意識形態的攻擊，西川、濱田倡導的文學理念，暗藏清理帝國境內殘餘左翼文藝傳統的台灣現實主義文學的意圖，成了官方系列收編本土文壇的最後一役<sup>51</sup>。

<sup>46</sup> 柳書琴，〈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台灣的文學活動〉，頁146。

<sup>47</sup> 工藤好美，〈臺灣文化賞と臺灣文學〉，《臺灣時報》1943年3月，頁98-110。柳書琴曾分析工藤好美的評論，認為表現出「穩重的學院派評論風格及文藝批評功力」，柳書琴，《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2005），頁456。

<sup>48</sup> 柳書琴，〈誰的文學？誰的歷史？——日據末期台灣文壇主體與歷史詮釋之爭〉，《新地文學》4（2008年6月），頁67。柳書琴指出：「西川滿主導之《文藝臺灣》與張文環等人主導之《臺灣文學》，兩大文學集團之意識形態競爭淵源已久，1940年代初期的『外地文學』與『地方文學』等論述已有較勁之意；工藤一文不過是個導火線」，《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頁454。

<sup>49</sup> 濱田隼雄，〈非文學的感想〉，《臺灣時報》1943年4月，頁77。

<sup>50</sup> 西川滿，〈文藝時評〉，《文藝臺灣》6卷1期（1943年5月），頁38。

<sup>51</sup> 柳書琴分析濱田隼雄與西川滿前引文之論述，指出他們「藉著『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或日本古典文學傳統來檢核台灣文學，痛批台灣作家的現實主義文學對於皇民化和決戰態勢不積極、不肯定，是非『皇國文學』的『投機文學』。兩人一搭一唱頗有共識，因此論爭的發生似非偶然。」雙方人馬在《文藝臺灣》、《臺灣文學》、《臺灣時報》、《臺灣公論》、《興南新聞》文藝欄等多處反覆論辯，參考柳書琴，《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頁456-463。柳書琴，〈誰的文學？誰的歷史？——日據末期台灣文壇主體與歷史詮釋之爭〉，頁67-68。

歷經文學者統合大會、現實主義論爭，在第二回「文藝臺灣賞」公布時，《文藝臺灣》社旨已由樹立「台灣的日本南方文學」一變為樹立「皇民文學典範」<sup>52</sup>，在作品中的理念實踐則展現統治者殖民地想像的皇民教化成果，將日本帝國統治台灣的歷史，轉化為正當的、現代化的自然進程敘事，如濱田隼雄描寫明治三〇年代日本占領台灣發展糖業的過程的〈草創〉、西川滿以 1985 年乙未戰爭為題材的〈台灣縱貫鐵路〉。「台灣文學」在「台灣」作為「日本新領土」、「日本南進基地」的時代意義下，與日本中央文壇同步投入順應時局與配合戰爭宣傳的寫作，一方面反映了文藝集團對總督府、新統制機構與政策的高度扈從，一方面也顯示出，自許為南方文化指導者的《文藝臺灣》，唯有加強皇民化、樹立「皇民文學典範」，才能進一步指導南方／南洋，使廣大的南方文化能與帝國政治發展同步。

1943 年 11 月的「臺灣決戰文學會議」決議台灣文人當以筆為劍，為大東亞戰爭貢獻一己之力。席間西川滿提議將文藝雜誌納入「戰鬥配置」，並獻上《文藝臺灣》，1944 年 1 月 7 卷 2 期終刊號出版後廢刊<sup>53</sup>，作家或組織的「南方文化」理念褪去，代之以「皇民文學」的戰袍。

## 五、結論

日據時期作家的「台灣觀」決定了作家書寫的視野，《文藝臺灣》在將「台灣」視為帝國版圖中南方區域而存在，並不是為台灣本土而存在的「台灣文化」，其「南方文化」理念，是以台灣作為「地方文學」出發，隨著殖民統治建設的推進，台灣社會逐漸被視為日本一部分的南方文化，殖民地上再現的日本帝國圖景，現代性的必然主張，左右著文化理念的形成與實踐。

隨著台灣因帝國南進政策而水漲船高的地位，《文藝臺灣》強調在台灣的日本文學是南方文化的代表，台灣成為南方文化的中心，南方文化以殖民成就的自信，殖民地建設、皇民教育的功績，以及現代化必然性的美感標準等面向，呈現光明勝利的歡喜。

<sup>52</sup> 《文藝臺灣》4 卷 3 期（1942 年 6 月），頁 26；6 卷 4 期（1943 年 8 月），頁 39。

<sup>53</sup> 參考《文藝臺灣》終刊號（1944 年 1 月）頁 34-37。

以殖民地台灣的特殊地理條件，並不是不可能由此孕育出日本帝國的南方文化，但在國家機器的干預與統制日趨嚴重的情形下，該文學集團最終與日本中央文壇同步，投入順應時局與配合戰爭宣傳的編輯與寫作，「地方」、「南方」的理念，置換為「皇民」、「聖戰」的口號概念，以文學追求必勝，以文化仿擬為皇民，文化理念與實踐的可能性被搗碎，全部統合至為「日本帝國」的概念効勞。

處在日本帝國政治地理中介地位的台灣，在帝國經濟、軍事化力量壓抑下，在台日人文學集團向政治傾斜、妥協的過程中，文學因此獲得傳播的力量，但也傷害了文學書寫本身，所有組織的、作家的理念或實現的可能性，呈現了遭扭曲、宰制的面貌。在政治、軍事、經濟發展下，文藝所應展現獨特的任務是什麼，也許可以用島田謹二在決戰時期對外地文學非政治性期許的話來回答：

把不同風土下之民族的想法的感覺方式、生活方式的特異性，讓它栩栩如生的「就著生命」描寫出來的話，那就會完成一種生之縮圖，就會產生所謂「政治的態度」以外，深深植根於文學獨特之領域的一種嶄新的現實主義。<sup>54</sup>

<sup>54</sup> 〈臺灣の文學的過現未〉，同註 11，頁 111-112。

## 參考資料

### 一、雜誌、小說文本

- 《文藝臺灣》，臺灣文藝家協會、文藝臺灣社，1940年1月-1944年1月。  
西川滿著、陳千武譯，《西川滿小說集》2（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  
西川滿著、葉石濤譯，《西川滿小說集》1（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  
西川滿著、黃玉燕譯，《台灣縱貫鐵道》（台北：柏室科技，2005）。  
濱田隼雄著、黃玉燕譯，《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技，2004）。

### 二、專書

#### （一）中文

- 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1）。  
柳書琴，《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出版，2005）  
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台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

#### （二）日文

- 中村孝志，《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日本南進政策與台灣》（台北：稻鄉出版，2002）  
中島利郎、河原功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東京：綠蔭書房，1998）。  
後藤乾一，《近代日本と東南アジア——南進の「衝擊」と「遺産」》（東京：岩波書店，2010）。

### 三、論文

#### (一) 中文

吳昱慧，〈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南方想像」——以龍瑛宗為例〉（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吳叡人，〈重層土著化下的歷史意識：日治後期黃得時與島田二的文學史論述之初步比較分析〉，《臺灣史研究》16卷3期（2009年9月）。

邱雅芳，〈南方作為帝國欲望——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

柳書琴，〈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台灣的文學活動〉（台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柳書琴，〈誰的文學？誰的歷史？——日據末期台灣文壇主體與歷史詮釋之爭〉，《新地文學》4（2008年6月）。

張文薰，〈「外地」的意義——濱田隼雄的文學軌跡〉，《台灣文學的東亞思考——台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年7月）。

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以「外地文學論」為中心〉（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

#### (二) 日文

工藤好美，〈臺灣文化賞と臺灣文學——特に濱田・西川・張文環の三氏について〉，《臺灣時報》279（1943年3月）。

河西晃祐，〈表象としての「南方」——一九三〇年代における「南方——東南アジア」觀の形成——〉，《歷史評論》620（2001年12月）。

松風子，〈臺灣に於けるわが文學〉，《臺灣時報》（1939年2月）。

橋本恭子，〈在台日本人の郷土主義——島田謹二と西川滿の目指したもの〉，

《日本台灣學會報》9（2007年5月）。

濱田隼雄，〈非文學的な感想〉，《臺灣時報》（1943年4月）。

